吴宓与陈寅恪的晚年相见

■人物春秋

解放后,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,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授,两人天各一方。1950年9月18日,陈寅恪致函吴宓:“现已将拙著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约十六万字十一月底出版。当寄呈一部求教,并作为纪念。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。吾辈之困苦,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,自不待言矣。”此后的历史证明陈寅恪的此番话不是杞人忧天,而是一一应验。

吴宓早在解放前就“绝口不谈时事,学生登门求教,他先宣布戒律: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,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”。至于陈寅恪更是“不谈政治,不论时事,不臧否人物,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”。但是即便如此,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,他二人还是与时势格格不入,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风波。

一开始吴宓还力求改造自己,加以适应,但收效甚微。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,他于7月8日在西南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他在解放后的28年中,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——《改造思想,站稳立场,勉为人民教师》。据说,毛彦文在60年代初期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看到这篇文章后说:“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,心地善良,为人拘谨,富有正义感。竟被侮辱一至于此,一代学者,默默以没,悲夫!”

1964年,吴宓因为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(他指导过的外语系的一个青年教师因为作风有问题,撞在“四清”运动枪口上,被开除党籍。吴宓因用“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腐蚀青年”而受株连)而被学校罢了课。

陈寅恪的日子似乎要比吴宓稍好一点,尚能上课并继续写书。1958年,批判厚古薄今,郭沫若写给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,点了陈寅恪的名,把他划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,陈自此再不登讲坛,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。

1961年7月30日,吴宓自重庆给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,除了述说近况,还提出“来粤晋谒”。陈寅恪收到信后,立即于8月4日由夫人代笔复信,告知到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,包括怎样选择到中山大学的路线、车资几何、饮食住宿等等,甚为详尽,其中甚至出现:“兄带米票每日七两,似可供两餐用,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,或无问题。”这样的字眼。信末说:“现在广州是雨季,请注意。夜间颇凉。”据说这是自1949年后,陈寅恪来往信函中字数最多的一封,可见他对这次老友来访的看重和期盼。因得知吴宓想道经武汉赴粤,陈氏夫妇又给在武大的刘朴写信,让他转告吴宓:“在武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。当命此女小彭(或其他友人)以小汽车往东站(即广九站)迎接。”

1961年8月23日,吴宓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,开始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壮游。25日,到达武汉,住老同学刘朴家中。因武大旧友不断来访,直到29日他才离汉赴粤。30日,陈寅恪派两个女儿等亲属去接站。由于火车晚点,吴宓到达陈寅恪家中时,已是30日的子夜时分了。陈依然端坐着等待,听说吴宓到了,他坚持用拐杖探路,摸索着走出门外。陈激动地跟吴聊到了零点30分。

钱绍武绘青年陈寅恪小照(右)
钱绍武绘青年吴宓小照(左)

吴宓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。第三天晚上,中大校办设宴款待吴宓,请陈寅恪夫妇做主人,并请了吴宓在广州的旧日熟人朋友学生作陪。计有:中文系女教授冼玉清、历史系主任刘节及其夫人钱澄、外语系教授梁宗岱及其夫人,还有吴宓的长女、时在广州工作的吴学淑。

吴宓在广州期间每天都去陈宅探访,有时不止一趟。他们叙旧、吟诗、论学,陈寅恪向吴宓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。吴宓在日记中说:“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,即不谈政治,不论时事,不臧否人物,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,尤以病盲,得免一切周旋,安居自守,乐其所乐,不降志,不辱身,堪诚为人所难及!”当年正值困难时期,“吃饭”对每个人来说,都是一件大事。吴宓在广州的几天,得到了陈寅恪夫妇细心且丰盛的款待。陈氏夫妇多次在家招待,或送食品到招待所。吴宓日记频有陈家“送来炖鸡一碗,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”、陈寅恪夫妇设家宴,“鸡鱼等肴馔甚丰”“在陈宅晚餐,肴馔丰美”等记载。

吴宓与老友畅谈四天后,便匆匆结束了广州之行。听说他要去北京,陈氏夫妇再三叮嘱他跟发妻陈心一破镜重圆。此前的1959年1月29日,吴宓曾给陈寅恪夫妇写了封长信征求他们对他和陈心一复婚的意见。陈寅恪夫妇马上回信,表示尽力赞成。还将陈夫人唐稚莹60岁生日时,陈所写的一副寿联:“乌丝写韵能偕老,红豆生春共卜居。”寄给吴宓以促他复婚的决心。临别,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自炒的花生让吴宓带去一包给陈心一。

短短几日,陈寅恪夫妇分别多次题诗相赠,陈诗中有“五羊重见九回肠”之句,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,于陈寅恪而言,绝非一种礼节上的往还,而是打破了他多年生活上的平静和寂寞。

9月3日,是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,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,总题为《赠吴雨僧》,其中四句为:“问疾宁辞蜀道难,相逢握手泪汍澜,暮年一晤非容易,应作生离死别看……”正如陈寅恪所料,这是两位结交50年的挚友的最后一面,此诗终成谶语。

1966年,文化大革命暴发,吴宓与陈寅恪均遭受残酷迫害。文革一开始,吴宓就被揪出来,作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,屡遭批斗。1968年吴宓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,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日记文稿全部被抄走。1971年6月,吴宓的右眼长了白内障,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,忽然瞎了。从自己一目失明想到陈寅恪双目失明,从自己的痛不欲生,想到陈寅恪的生死不明。9月8日,他违背不能随便跟人通信的训示,冒着极大风险,径直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,询问陈寅恪一家情况,读之令人肝胆欲裂。全信如下:

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:

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,年事已高(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),且身体素弱,多病,又目已久盲。不知现今是否康健生存,抑已身故(逝世)?其夫人唐稚莹女士,现居何处?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、学生多人,对陈先生十分关怀、系念,极欲知其确切消息,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,详询一切。故特上此函,敬求贵校(一)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、实情。(二)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,请其复函与宓。不胜盼感。附言:宓1894年出生,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,又在国内清华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。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,访侯陈先生及夫人(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)。自1950以来,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(1958年以后,在中文系)。但自1965年起,已不授课。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。复函请写寄“四川省万县专区,梁平县,屏锦镇,七一房邮局,交: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,吴宓先生收启。”

即致

敬礼

1971年9月8日吴宓上

周一良先生在其绝笔之作《吴宓先生与周氏兄弟姊妹》(2001年9月28日口授)中说:“吴先生身陷‘专政’囹圄,甘冒自己受更大迫害的危险,写信到中山大学询问陈先生生死存亡的行动也是感人肺腑的”,“这封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旧知识分子……朋友之情的典型写照。”

直到12月9日,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,方才得知陈寅恪夫妇已于1969年10月7日和11月21日相继去世。吴宓当天写了长篇日记,以代替悼文,以长歌当哭,他哭老友,也哭自己,说:“宓自伤身世,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,异恒悲痛。”

吴宓哪里知道,此前陈寅恪也是一再受辱。1967年底,红卫兵要抬七十八岁又盲又跛的陈寅恪去批斗,陈夫人阻止,被推倒在地。结果,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替陈寅恪去挨斗。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,刘答:“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,感到很光荣。”1969年5月5日,陈寅恪以八十高龄,被迫作“口头交待”,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。讲话中有“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”之语。同年,陈寅恪有《挽晓莹》一联:“涕泣对牛衣,卅载都成肠断史。废残难豹隐,九泉稍待眼枯人。”

晚年吴宓常以背诵陈氏诗文来寄托对好友的绵绵无尽哀思。1973年6月3日《雨僧日记》:“夜一时,醒一次。近晓4:40再醒。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‘隆春乍见三只雁’,莫解其意。”

1978年1月14日,吴宓突然吃不下饭,家人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。弥留之际,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回光返照,而是一直处于半昏迷之中。17日凌晨3时吴宓永远地闭上了那双原本就已经近乎失明的眼睛,享年85岁。 □ 史飞翔

吴宓1959年7月29日评陈演恪诗日记手迹

徐悲鸿《愚公移山》的画中人物为何是印度人

徐悲鸿油画《愚公移山》。即将现身拍卖现场的

从嘉德拍卖获悉,徐悲鸿的油画《愚公移山》将现身今年春拍。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这幅作品描绘中国人所熟知的“愚公移山”故事,但徐悲鸿创作该作时并不在国内,甚至模特也并非中国人。这是为什么呢?

故事还要从抗战时徐悲鸿赴南洋举办筹赈画展说起。

1939年,徐悲鸿即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——画展以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、为国内抗战筹款为目的。

当时的画展采取发售筹赈名誉券方式——捐款100元可得徐悲鸿作品一张,捐款200元可指定徐悲鸿另画一幅。结果尚未开幕已筹得2500元,整个展览卖画百幅。画展结束后,徐悲鸿应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做客印度。

从此,徐悲鸿开始持续三年多的南洋之旅,期间在多地举办画展,所筹款项用于抗战。正是在这段时间,《愚公移山》得以完成。

1940年2月,徐悲鸿正式开始创作《愚公移山》。他在信函中称,自己“将竭尽一年之力,写出三四幅重要画作”。当月下旬,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为《愚公移山》创作了“人物写生和草图有数十幅”。

事实上,前一年8月,已有记录显示,徐悲鸿在“为《愚公移山》作习作”。1940年4月,徐悲鸿在致舒新城的信函中写道:“一月以来,将积蕴二十年之《愚公移山》草成,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。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,拟以两月之力,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,再(归)写成一幅两丈长之(横)大油画,如能如弟理想完成,敝愿过半矣。”

这显示徐悲鸿创作《愚公移山》早有计划,这幅作品甚至已“积蕴二十年”。

1940年3月,徐悲鸿又为《愚公移山》作木炭速写画稿多幅。3月下旬,《愚公移山》草稿完成。4月,徐悲鸿赴喜马拉雅山大吉岭继续创作。

《徐悲鸿南洋时期年表》显示,在大吉岭的三个月内,徐悲鸿完成了中国画版本的《愚公移山》。这幅作品因被收入人教版语文教材作为课文插图,而颇为人所知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徐悲鸿在《我在印度》中还详细记载了1940年2月在印度国际大学为创作《愚公移山》做准备情况——“该校学生争做模特儿,大腹便便的炊事员拉甲枯马尔啼亚很‘荣幸’地成为主要模特儿之一,高兴、认真、随叫随到,做了开山、劈石、挑土等很多画稿的‘范人’。因是巨幅创作,历时足足一个月”。

《一段确定与不确定的历史——徐悲鸿在星马》指出,徐悲鸿之所以能在旅居印度时完成《愚公移山》的创作,“有一个原因不能被忽略,就是产生于印度的创作激情,即与印度模特儿的力量感有很大的关系”。“这对于比较依赖模特儿的徐悲鸿来说,是一个关键条件。”

这一年的7月,徐悲鸿结束在大吉岭的创作,返回印度国际大学,此时他已着手油画版《愚公移山》的创作,至9月,完成巨幅油画《愚公移山》。

但战火很快蔓延到南洋。1941年,正当徐悲鸿为赴美展览做准备时,整个南洋的局势也愈发紧张。这一年12月,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零式战斗机偷袭珍珠港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12月8日凌晨,十余架日本战机轰炸新加坡,日本和英美盟军正式开战。

1945年,与徐悲鸿等人在重庆中国美术学院(重庆磐溪石家花园)。左起为廖静文、徐悲鸿。

此时,新加坡已危在旦夕,赴美办展也已成泡影。为躲避日机轰炸,徐悲鸿将带不走的书画、文玩等物分别存放在友人处。《徐悲鸿南洋时期年表》记载,其中的部分藏品被封在皮蛋缸中,埋到了钟青海校长所在崇文学校的一座枯井里。

在嘉德拍卖官网公开的资料中,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在《讲述<愚公移山>背后的故事》中提及,枯井中的藏品就有包括《愚公移山》在内的几十幅油画。

1942年1月,徐悲鸿登上离开新加坡的轮船。2月,新加坡沦陷。

此后,徐悲鸿辗转回到国内。终其一生,一直未有机会再访新加坡。

1945年,新加坡光复。有记载显示,大概在这一年9月时,藏于枯井书画珍玩被一一起出,并在崇文学校的大教室里晾晒受潮的物品,清理、晾晒了两个多月。

这此后这幅《愚公移山》的去向出现分歧。徐悲鸿之子徐庆平称,父亲多次打听这批作品,但未获回音。

1953年徐悲鸿病逝。次年,新加坡举办“徐悲鸿遗作展”,展出了浩劫幸存于新加坡的油画《愚公移山》等80余幅徐悲鸿遗作。1985年,新加坡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连续刊登了《徐悲鸿藏宝记》,报道详细介绍了徐悲鸿藏画之事。

而在获知这批作品下落后,徐庆平曾对媒体表示,自己并没有“想追回画的意思”。

如今,中国画《愚公移山》与巨幅油画《愚公移山》一同收藏在徐悲鸿博物馆。今年1月,两件作品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而本次将亮相拍场的油画《愚公移山》画幅较小。大小两幅油画画面几乎完全相同,而中国画作品人物虽有所调整,但大体相同。

据悉,《愚公移山》将于6月19日晚在北京拍卖。 □ 温璐

■视点

■往事

甜水井街的赵家大院

甜水井街在清代光绪年间出了个大人物,叫赵舒翘,从刑部尚书干到军机大臣,是晚清陕西出的最大的官了。赵的老宅离我1956年上小学的私立东西甜水井街小学不远,甜小是55号,赵宅是37号。

坊间相传,早先多半条巷子都是赵家建起来的。清末民初时赵家在西安城中其他街巷还有几处宅院,如草场巷、南广济街北口、桥梓口路西等处。最后这几院房产均已变卖,其中同福楼饭庄租用的北桥梓口路西的院子抗战时被日寇飞机炸毁。最后硕果仅存的,只剩下赵氏后裔居住的甜水井街的被称为“赵公馆”的赵家大院了。

记得五六十年代留下的赵家大院,虎威仍在,尤其是门楼很有气派,大概有三间门面那么大,门口蹲一对凶猛的石狮子,当年上小学的我,每当从此经过就要拿手去摸那石狮子,石狮子黑光铮亮,经年累月的不知被多少人摸过。

作为长安人的赵舒翘,为官有清廉之名,关心桑梓,曾先后捐银2.4万两,于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为乡人修桥。这桥22孔,横跨沣河,长约140米,名古灵桥,赵舒翘还为桥头牌楼亲书题了亭额:“晴连渭树,影射昆池,汉鲸秋卧,周杞春荣。”这桥老百姓也叫赵福桥,是因为“舒”在长安的方言里和“福”同音,“翘”又同“桥”谐音,所以叫赵福桥,反映的是草民对赵舒翘感恩戴德的心声。另外,他在刑部任职期间,不畏权势,不徇私情,执法公断,“以廉正声明朝野”。光绪年间全国三大冤案之一的河南呼冤案,主审就是赵舒翘,这一案声震朝野,极大抬高了赵在民间的声望。

赵舒翘因处置冤案而赚足了政声,但他自己却逃脱不了蒙冤而死的悲剧下场。那是1900年,赵舒翘升任军机大臣第二年,八国联军攻陷北京,赵舒翘护驾慈禧太后逃到西安。侵略者同清廷代表谈判时,把赵指为支持义和团的“祸首”,威逼清廷严惩赵舒翘。慈禧太后屈从帝国主义的淫威,答应其无理要求。把对赵舒翘的“革职留任”改为“交部严惩”,再改为“斩监候”,最后定为“斩立决”。消息传出,先是西安城内绅民三百余人联合为赵请命,愿以全城人保其免死。接着被激怒的民众竟然在鼓楼聚集数千人,声言欲劫法场;慈禧太后若杀赵舒翘,便请回京。迫于当时的民情激愤,慈禧太后不敢将赵公开处死。下诏改为“赐死”,令其在西安家中自尽,并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督执行。当日,赵是先吞金后又服砒霜,命硬的他折腾一整都未死。在慈禧严命催促,和岑春煊直接逼迫下,家人被迫用纸糊赵七窍,灌以烧酒方才魂游西方世界而去。那是阴风飕飕、阴云密布的1901年2月24日,赵舒翘时年54岁。

传说赵舒翘死后被慈禧封为王曲城隍庙城隍,西安长安王曲城隍庙,可不是一般小城隍庙,其庙为总城隍庙,是当时全国级别最高的城隍庙。

王曲城隍庙总城隍传说有三,一为汉代纪信,为救汉高祖刘邦而死,被封为主持阴曹地府的地皇,并赐黄袍加身,庙建上林苑(今王曲镇),“文景”二帝时将“地皇”庙改为“城隍”庙。二说为明朝时,王曲城隍神被朝廷封为正三品的“忠烈侯”,为全国十三省总城隍神。《陕西省长安县地名志》中说王曲镇城隍庙祭祀明代御史邹应龙,明嘉靖皇帝钦封弹劾扳倒大奸臣严嵩的御史邹应龙为十三省总城隍,以监督天下不法与奸邪之徒。三说就是清代赵舒翘了。

赵舒翘死后,民间的不满激愤继续发酵。为其鸣冤叫屈,一时成为社会民情关注之焦点。1901年春,西安相传城南长安王曲天空云彩中赵舒翘显了形。消息迅即传入仍滞留西安的慈禧太后耳中。遂口谕封赵舒翘为长安王曲总城隍庙的总城隍爷。真实是赵舒翘为慈禧挡了灾,当了替罪羊,其心存对朝廷忠义,让慈禧也感有愧,她曾对身边人说:“唯赵舒翘死得可怜!”言至此泪下如雨。为了安抚平息民怨沸腾,以期在阴间成神灵的赵舒翘能继续护佑日薄西天、朝不保夕的大清朝,才口谕封赵舒翘为总城隍爷的。

另外,慈禧西狩(也叫西逃)途中,在其身边办理支应的怀来知县吴永在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中写道:“赵舒翘之被赐死‘终不能不谓之冤,青史是非,悠悠众口,吾尤愿为死者一洗耳。’”当时西安城还有秦腔戏《赵舒翘哭狱》上演,可见民心如秤。

赵家后来自然就败落了,历经五十多年风雨飘摇,赵家大宅院部分建筑和门楼仍在。九十年代初这一带大规模拆迁,先从低洼地的四知村开始,1995年就开始拆甜水井,记得赵家大院是文物部门不让拆,谁知当地政府不管这一套,听说区上领导亲自督战,端了个凳子坐到现场指挥,把赵家拆光了。而我记忆中那个气派非常的门楼,后来流落到华县一个私人建的园林,叫“非园”,赵家的门楼成了这个“非园”的门楼,据介绍这门楼顶部砌有镂空的砖,其余为高浮雕,上有变形夔龙图案,中间镶嵌有四个砖雕大字“福禄光明”,两边配以牡丹荷花、花草虫鸟,雕工细巧,精美绝伦,给人富丽堂皇、尊贵无比的奢华感。多亏这个非园似园的所在,让西安甜水井赵家大院曾经的影子,壮丽地残存了下来。

我一直寻觅着赵家后人的影踪。终于结识了赵家第4代,即赵舒翘的重孙赵农。赵农就一直厮守着赵家在东西甜水井街的老宅大院,直至被拆迁。他手中有拆迁前老房子照片,其中一张我十分欣赏,树影斑驳掩映下,院落十分萧条,衰落得有点风雨飘摇愁刹人的凄然感觉,老瓦房、老格子窗内住的是赵农,惟有白纸糊的窗户上现出一点高光和顽强生机。在这间厦房中,他接待过作家贾平凹,一起喝茶谝闲传。

和赵农说起赵舒翘死后被慈禧封为王曲城隍庙城隍的传说,赵农介绍说:“到‘文革’前还有王曲城隍庙道士进城到甜水井街赵家,商讨汇报庙中筹款诸事项呢?!”看来这传说还是真事。 □ 朱文杰